

民盟的民主建国之路

□ 孙 信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成员人数最多的民主党派。

民盟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在追求民主和平统一建国过程中经受洗礼，经过艰苦的斗争和自主的选择，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与中共合作，参与建设新中国的革命道路。

坚持团结民主抗战 创建中国民主同盟

民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加紧迫害各小党派。面对这种形势，各党派既担心国共关系破裂，影响抗日，又担心自身力量弱小，无法抵制国民党迫害，于是产生了联合起来的强烈愿望，试图建立一个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者”性质的政治组织，并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1939年11月23日，沈钧儒、梁漱溟、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左舜生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以求“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国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肆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对各党派实施高压政策。政治形势的发展，使“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中间势力，积极支持各党派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进一步联合起来。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等13位发起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由于在重庆不能公开活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特派梁漱溟到香港去办报，以便公开其组织并宣传政治主张。梁漱溟临行前专门拜访了周恩来并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梁漱溟到达香港后，共产党给予了人力和经费支持。10月10

日，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的消息，同时刊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公之于世。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表示声援和支持。

随着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空前活跃并积极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大批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纷纷要求加入。但由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三党三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职教社派、乡建派、救国会派）的联合体，又有青年党把持盟务，只有“三党三派”成员才允许入盟，其他人员则被拒之门外，这严重阻碍了同盟的发展。为了接纳更多的民主人士，扩大其社会基础，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取消团体会员制。这次改组打破了某个党派控制民盟的局面，为大量无党派进步分子敞开了大门，民盟随即得到了迅速发展。

反对独裁内战，力 争和平民主建国

抗战胜利结束后，国内斗争进一步激化，国共两党围绕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产生了严重分歧。民盟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希望通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和平民主建国。

1945年8月12日，民盟主席张澜就时局发表谈话，呼吁“国共两党军队立即停止各地足以促成大规模内战的一切摩擦，并立刻召开党派会议，从事团结商谈，以使内部的政治纠纷能迅速而彻底地得到解决”。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顾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专程访问张澜，商谈国共谈判情况，张澜亦积极出谋划策。为此后政协会议中双方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1945年10月1日—12日，民盟在重庆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等文件，提出了“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政治主张，推选张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6年1月10日，由国民党、共产党、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人士参加的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前中国共产党与民盟有一个“君子协定”，即对政协会上各种重大问题的讨论，中国共产党与民盟都要事先交换意见，取得一致。例如，在代表名额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密切合作。政治协商会议最初商定的名额是：国民党9人，共产党9人，民盟9人，社会贤达9人，共36人。后来，国民党为了拉拢青年党，对民盟进行分化瓦解，以孤立共产党，硬要民盟让出5个名额给青年党。这期间，周恩来等人一再到特园向民盟负责人表明态度，民盟9个代表席位不能动，不能让步，“希望民盟坚持这个意见”并鼓励民盟内部除青年党外，今后要加强团结，准备在政协会中共同斗争”。最后商定的结果是青年党单独参加政协会议，不占民盟名额，由中国共产党让出2名，国民党让出1名，总名额增加到38人，民盟维持9个名额不变。最后确定的名额是：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盟9名，青年党5名，社会贤达9名。由于中国共产党主动让出两个名额，解决了民盟的名额问题，粉碎了国民党妄图通过分化和削弱民盟，操纵“多数”，以控制政协的阴谋。经过双方的密切配合和合作，会议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项决议。

政协会议结束不久，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就通过了反对政协协议的决定。国民党一方面进攻解放军，发动全面内战，另一方面残酷镇压维护政协决议、反对内战的民主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一批民盟盟员相继遭到国民党杀害。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不顾反对，非法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民盟拒绝参加；12月，民盟将投靠国民党的民社党开除盟籍。1947年1月，民盟召开一届二中全会，宣布不承认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不参加改组的政府。由此激化了同国民党的矛盾，遭到了国民党的疯狂报复，这一程度上促使民盟更快地加入革命阵营。

接受中共领导，参 加筹建新中国

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之后，迅速走向公开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亦加大了对民主党派的打击力度，民盟首当其冲。1947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

体”，并冠之以“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不承认宪法，企图颠覆政府”等罪名，要求民盟立即解散。为了全体盟员的安全，同年11月5日，民盟总部被迫决定解散，次日，主席张澜署名发表《解散公告》。民盟地方组织和盟员被迫转入地下斗争。

1948年1月5日—19日，民盟在香港举行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做出宣布恢复民盟总部、确定新的政治路线和新的组织路线等三项决定。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民盟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标志着民盟与国民党公开决裂。至此，民盟彻底放弃了“中间道路”的政治主张，全面走上了与共产党通力合作的革命道路。历经曲折的中国民主同盟终于获得了新生，迎来了光明的前途。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5月5日，民盟与其他民主党派一起，通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响应“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6月14日，民盟发表了关于开展新政协运动的声明，即：今天全中国人民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但只有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之后，才能获得保障；今天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和平的新中国，就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的障碍不可；今天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独立的新中国，必须脱离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反对南京骄纵狂妄的败军之象，以四两拨千斤的胆识勇气冲锋在前，极大鼓舞了昆阳守军士气，最终得以合力战胜号称百万的莽军，解决了更始称帝以降最大的一次危机。

1948年9月，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等应中共中央的邀请进入东北解放区，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筹备新政协。1949年9月21日—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张澜代表民盟发言，号召全盟“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相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使命”。10月1日，民盟代表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重大历史时刻。

民主党派与民主建国道路

时代开始，优秀人才要么无法施展抱负，要么被迫亡走他国。公元前355年，魏惠王和齐威王会面，双方在联合狩猎中巩固关系。魏惠王挟大国之威，志得意满地向齐国打听有什么宝贝，齐威王虽然年轻，但老成持重，自谦国内无宝。魏惠王带有挑衅的夸口，魏国虽然很小，尚有十颗直径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辆车子的大珍珠，并讥讽齐国为万乘之国，岂能无宝？齐威王凛然分辩道，齐魏对于以何为宝认识不同。齐国有大臣檀子、盼子、黔夫安守边境，楚、赵、燕皆为震惧；大臣初首治民政，路不拾遗，此四人光照千里，岂是明珠可比！珠玉为宝，根基动摇；以才为宝，山河安泰。论宝之语看出了品位、看出了境界、看清了实力、看出了魏国的未来。此后不久，齐、魏两国发生桂陵之战，田忌、孙臆围魏救赵，大破庞涓之军，魏国颓势渐显，山河日下。

往昔大魏，文、武雄烈，处在战国改革的最前沿，然惠、襄无继，霸业消散。吴起走了，商鞅走了，范雎走了，史起也留下了遗憾。大国兴霸，胜在庙算无漏，胜在贤能尽显，胜在矢志不移，魏一误再误，终败其国。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史称“中兴”，其于新莽乱世再造统一，从更始元年（23年）受命巡抚河北州郡起，至建武十二年（36年）并灭公孙述止，大致经历了略定河北、进取两京、铲平割据等主要阶段。过程中，在“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总战略指导下，逐步明确“柔道安邦”施政用兵方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边战边治、步步为营，终成大业。

高举“兴复汉室”与“解民倒悬”的义旗。新莽居摄以降，改革不当、更张频繁，以致民不聊生、变乱四起，刘秀起兵春陵之初，便与其他“义军”有着不同气质。

首先，关键时刻能以大局为重。地皇三年（22年）取得一系列小胜，也因新获不均引起内部矛盾，刘秀将宗人所得战利品悉数散发各部，及时稳定了军心、维护了团结。淮阳王更始元年（23年），新莽遣王寻、王邑率数十万大军围困昆阳，众将惊惧、手足无措。刘秀分析形势认为“外寇强大，并立御之，功庶可立”，于是亲率十三骑出城收兵救援，稳住了阵脚。随后刘秀领军数千回救昆阳，看准了莽军骄纵狂妄的败军之象，以四两拨千斤的胆识勇气冲锋在前，极大鼓舞了昆阳守军士气，最终得以合力战胜号称百万的莽军，解决了更始称帝以降最大的一次危机。

其次，从安民养民高度，着眼兴复汉室。更始定都洛阳后，遣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招抚河北，所过郡县考察吏治、废除苛政、安抚百姓，赢得了民心信服。地方豪强也主动向其靠拢，如骑都尉耿纯自愿归附，又相继获得河北实力派上谷太守耿况父子、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鄧邯、汉中王嘉及贾复等支持拥戴，迅速组建核心班底。此外，建武二年（26年），起高庙于洛阳，祭祀高祖、太宗、世宗，以重拾对汉室权威及治法的信念。

再次，善于收拢人心、为我所用，且把控得当。如淮阳王更始二年（24年）击灭王郎后，对之前部属与王郎往来书信一律不予追究，迅速安定了人心。击败数百万铜马、大彤、高湖、重连等部曲后，封其渠帅为列侯，使其各自继续领兵，及时安抚各路头领、消除诸将与新附者之间的隔阂，使数十万铜马兵成为平定天下的主力。

重塑“为政以德”与“止戈为武”的治安观。其施政用兵再造一统的过程中，注重“为政以德”与“止戈为武”相结合，树立了“兴王道于天下”的导向。

首先，初入河北时，赵缪王之子刘林曾建议掘破河水以灌赤眉，光武没有听从。对不愿受官禄的“处士”报以理解和尊重，如博士范升曾建议考察周党、王良、王成等人是否有真才实学，欲以虚夸、大不敬等罪罚，光武援引伯夷、叔齐不食周泰的典故，不予追究。处理大司空王梁屡次违反诏命问题，光武遣宗广持节问罪，将其押解至洛阳后，又予以特赦，命其为中部将守备冀关。

其次，不计前嫌、适才任用，审时度势、察纳雅言。建武四年（28年），起用新莽时的治世能臣侯霸，拜为尚书令以“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七年（31年），大司空江冯提请恢复司徒掾尉督察三公职能，听从司空掾陈元“劳心下士，屈节待贤”的建议，考虑立国未稳、不宜操之过急而将争论搁置。

再次，善于从政略高度把握战略实施，做到了“止戈为武”。建武二年（26年）平三辅，明确指示冯异“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于是将惩戒顽抗者与褒奖愿意归降有功者相结合，迅速扭转乱局。其后处置赤眉余众，既屯兵洛水以备不测，又予以充分善待，使之顺利降服。周旋于陇、蜀之间，灵

□ 丁 涛

汉光武帝再造统一策略

活运用武力威慑与政治招降，如因隗嚣有功于汉而以殊礼报之，随后又感动其亲信马援，使其愿意为招降出力，成功割裂了隗嚣与公孙述的勾连关系。对待公孙述同样如此，多次至书陈述利害祸福，规劝其早日放弃割据，甚至称其为“公孙皇帝”。另外，从战略高度积极争取河西窦融，为牵制分化陇、蜀合纵，提供了重要支撑。

力求“精兵简政”与“居重驭轻”相协调。以“居重驭轻”为指导，推行“精兵简政”，以便充分“休养生息”，并着力内外安防体系构建，重塑中央与地方及“四夷”关系。

首先，从减省官吏、提高效率入手，依据实际调整文武官制。如建武六年（30年）并省四百余县，压缩吏员至原来的十分之一。保留精干力量的同时，大规模退兵还农，颁布举贤才、纳谏言、修法度、轻赋税等诏令，理顺上下关系。还专门下令提倡薄葬、不再接收郡国贡奉，明确“文书调役，务从简寡”，以节省民力。平定蜀地后，适时释放僭武兴文信号，邓禹、贾复主动请辞，耿种也奉还将军印绶，以侯位参议军国大事，实现了和平收拢兵权。

其次，任用并容忍敢于打压权贵的官员，进一步规范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如建武十一年（35年），司隶校尉鲍永参劾赵王刘良送丧来歙时在城门与中部将张邯争道一事，获得光武支持而使朝廷上下肃然。著名的“强项令”董宣，也成就于这一时期。为排除地方州牧或郡守拥兵自重、不为遥制的危险，建武十八年（42年）“罢州牧，置刺史”，恢复并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力度。

再次，延续“以夷制夷”做法，加强武备的同时，着力拨乱反正、恢复朝贡关系，但不主动参与或过多干预边境以外的事务。如西域诸国曾多次提请重置都护，光武从“中国新定”“国疲民贫”出发而不设。经略诸羌方面，建武十一年（35年）在破羌以西修缮城郭、广置坞候，开沟渠、劝耕牧，招抚周边氐、羌为警备变乱之用，很快在寇多难治的金城站稳脚跟，极大减省了安防成本。对匈奴屡次犯边，多报以尽量克制，如建武十五年（39年），遣吴汉率领马成、马武等予以必要的反击。迁徙雁门、代郡、上谷百姓至居庸、常山关以东，后调整兵力部署以充实边防。



战国烽火，群雄并起，粮食越发显得重要，刀光剑影、浴血厮杀的背后，各国的农业发展也在暗中较劲。魏在战国时期最先崛起，兴农有独到之处，有些探索甚至惊心动魄。

君臣之争

魏襄王一次大宴群臣，酒酣耳热，兴致颇高，论及为臣之道，希望众人都以西门豹为榜样，恪尽职守。西门豹是文侯时期的魏国名臣，治理漳河，兴修水利，寓兵于农，将郾城治理得井井有条。大臣史起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西门豹没有面对郾城农业的根本矛盾，虽然初步解决了灌溉问题，但土地盐碱化严重，农田平均产量依然不高，以至于农民需要耕种加倍面积的田地，才能收获与良田相近的产量。

史起认为，郾城有漳河，具备良好的自然条件，完全可以用来改善土壤品质，如果西门豹不知道这一点

那是能力问题；如果西门豹知道这一点而不向国君进言，那是担当问题，不配作为百官楷模。寥寥数语，让魏襄王深受震动，他认真询问史起，是否真的可以用漳河之水改造郾城土地，他再次得到肯定的回答。

担当之问

魏襄王大喜之余，想派遣史起治理郾城，然而史起还有顾虑，因为他的解决方案是“激进疗法”，会在短时间内引发民众极度不满。这不仅需要史起本人有敢于担当的勇气，更需要国君义无反顾的战略定力，缺一不可。

在得到魏襄王授权和承诺后，史起毅然决然开始治理郾城土地。之前西门豹治理漳水，意在消除水患，以疏导为要诀，开凿十二条水渠，完善流域内水道系统。史起脑洞大开，把水患当成工具，放出超级大招，“决漳水兮灌郾旁”。这几乎是人为制造水灾，引漳河之水，淹没郾城的农田，民众一时无法理解这种看似荒唐之事，怨声鼎沸。史起自知难以全身而退，便深居不出。魏襄王原本的承诺经不起考验，派遣他人接替史起担任郾城主官。

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国谋划长久之利，史起或许早已知道“功成难以在我”，但所幸的是，他完成了最艰难的治理环节，也担负起了所有骂名。

一石二鸟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随着时间推移，史起的治理之策逐渐显现出功效。在决水之前，史起早已考虑到漫灌之后的排水方案，继任者按策而行，漳河之水很快消退，冲刷了郾城土地中的盐碱成分。同时，泛滥河水中的肥沃淤泥沉淀下来，使土地品质大大提升，一害去，一利来，以成一石二鸟之效。

郾城之田焕然一新，“终古污卤兮生稻粱”，民众大获其利，魏国也升级了一个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这其实就是《吕氏春秋》记载的“浴土”之法，放淤压碱，改造之后的郾城农田，亩产达到一钟，可以媲美郾国渠滋养的关中良田。

失才之憾

史起开河，惊世骇俗，却富国兴邦，但没有机会施展其才。从魏惠王